

# 陕西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分别成为唐、宋、明、清时代进士录取最多的地方

## 中国古代最能考的省，凭什么？

□吴润凯

### 唐代看长安和洛阳

科举制度始于隋朝，被唐朝继承并发扬光大。不像宋代以后有“科举名录”一样的档案簿，唐代没有科举及第的完整名单。

在目前已知的极不完整的数据中，唐代籍贯可行的科举及第者，是648人。

其中，关内道159人、河南道151人、河北道132人，进士人数位居前三。

看到没，唐代考科举最牛的地方，都是典型的北方中原地区，主要包括现在的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这几个省份。这几个地方，产生了接近全国70%的进士。

你要是穿越过去，千万别傻盯着东南沿海或长江流域一带。记住那时候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都在北方黄河流域一带。唐朝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实行双首都制：西京长安和神都洛阳。这两个地方，正是最出科举人才的关内道和河南道的核心。

原因无他，举国科举的政策照顾和教育资源，都集中在那里。

长安所在的京兆府选送的举子，前十名被称为“等第”，坐等及第。如果哪一年礼部不给面子，多让其中几个落榜，京兆尹（首都市长）就要发飙，给礼部写文书抗议，让考官好好解释为什么要让首都的考生落榜，这到底是几个意思！

这种权力优势，是外地州府不可能有的。

洛阳则主要得益于武则天统治时期。当时，武则天将洛阳当作实际首都，在洛阳、长安分别开考，录取进士，而洛阳的录取名额竟是长安的三倍。

一直到安史之乱后十余年，776年，洛阳的科举才被停掉。但已为洛阳乃至河南道的举子，提供了诸多便利。

唐代的科举公平性差强人意，基本是政治本位决定录取名额。

唐文宗太和二年（828年），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科举主考官。

一堆官员跑到崔郾家，向他推荐自己的门生。大名士吴武陵拿着《阿房宫赋》，向崔郾力荐杜牧：“此人不当状元，谁能当？”

崔郾面露难色，说今年的状元名额早被预定了，只能给杜牧安排个第五名。

### 福建人在宋代崛起

跟唐朝科举爱开后门，政策照顾明显等做法不同，宋朝科举一开始就讲究公平，考卷不仅要糊名，还要专人誊录，避免考官认字迹打分。

科举真正成为平民阶层上升的通道，始于宋朝。

宋太宗在位期间，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，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堂弟吕蒙亨，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均，这三个人在同一届科举中，都考中了进士。

殿试时，宋太宗发现了他们的名字，直接拍板说：“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。”意思是，你们这些官二代，就别跟寒门子弟抢了。于是，这三个人的名次全让给了寒门子弟。

没背景，比有背景还重要。统计显示，整个宋代，布衣出身的进士占了一半以上。

但是，宋朝科举有新的问题：南方人太能考了，导致北方人心理很不平衡，双方为此吵闹不休。最著名的一次，是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欧阳修，为科举录取方法是否公平，大吵了一架。

司马光说，北方有的路（相当于现在的省），几十年来竟然连一个考上进士的人都没有，可见全国一张卷统一录取，这种做法看似公平，实则太不公平，应该按照人口比

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自隋代开始，实行了大约1300年。每个时代，最能考的人都来自不同省份。唐代：陕西人；宋代：福建人；明代：浙江人；清代：江苏人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



欧阳修(左)和司马光曾为科举如何录取吵了一架。

例，给各路分配名额，逐路录取。

欧阳修很不认同司马光的说法，他争辩说，科举都是匿名考试，中榜后才知道籍贯，这么公平的制度去哪里找？北方进士少，只能说明北方人书没读好，说明不了其他问题。国家考试选进士，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把最好的人才选出来，而不要搞成地区间的分猪肉。

双方的理论，各有道理。但最终决定政策走向的，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。

在同为江西人的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，科举沿袭了全国统一录取的做法；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后，司马光上位，就开始试行“分省录取”。

即便如此，整个北宋期间，南方人仍将九成进士收入囊中，北方进士仅占10%左右。南宋时期，因为北方基本沦陷，95%以上的进士都来自南方地区。

从具体省份来看，福建、浙江、江西三省的进士人数高居全国前三。

根据《福建通志》记载，宋代福建进士共7043名，排名全国第一。

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

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（有籍贯者），算下来，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。而且，比位居第二的浙江，整整多了2000多名进士，形势不是小好，是一片大好。

当时人不无夸张地说：“龙门一半在闽川。”福建人绝对是当时全国最能考的。

有人分析说，两宋时期，尤其是南宋，比较靠南的省份受益于远离宋金边界，免受战争侵扰，经济与文化也更加稳定发展。浙江、福建和福建，因此崛起。

福建在十二、十三世纪，由于早熟稻的推广，海上贸易的繁荣，以及如朱熹那样的大学者的移入，一下子成为文化先进的省份。

### 明代始用“南北卷”
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谁家祖上没阔过？但北方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史实：唐代以后，在科举之路上，最阔的永远是南方省份。

风水轮流转，只是转到南方哪个省的问题。

在科举上，宋代的江西，排名仅次于福建和浙江，稳居前三。

明朝开国后的前100年，江西凭借这些文化积累迅速崛起，并超越闽浙两省，成为全国最能考的省份。

尤其是赣江中流的吉安府，在明初100年间，产生了426个进士，以及33个巍科人物（巍科人物，特指会试第一名和殿试前四名）。这两个数据，分别占全国同一时期的1/12和1/4。

在1400年和1404年连续两次科举殿试中，共有一甲进士6名，吉安人包办了5名。真的是全国科举看江西，江西科举看吉安。

整个明代的科举，可以分三段看：前面100年，最能考的是江西人；中间100多年，浙江人发力，比江西人还能考；最后四五十年，江苏逐渐取代浙江。

综合下来，明代全部24800多名进士中，产生进士最多的三个省份是：浙江3697人，江西3114人，江苏2977人。

有来自福建的朋友问了：两宋最能考的福建人，这时去哪儿了？

明代福建以2374名进士，排全国第四。总数是比前三名省份弱一些，但不是弱在考试能力，而是弱在人口总数。

明代福建的人口仅有170多万，比起动辄五六百人口的浙江、江西、江苏，显然吃了大亏。

所以，如果按人均进士数计算，福建人依然是全国最牛的。

这个省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13.26人，是浙江的两倍，江西的2.85倍，堪称一骑绝尘，无人能敌。

对于整个帝国而言，老问题又来了：人才都出自东南，其他地方的人还有什么奔头？

早在明初，朱元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。这名开国皇帝是南方人，这逼迫他必须向北方士子释放更大的诚意，从而凝聚整个帝国。

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三月，会试放榜，考上的51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，无一北方人。

北方士子群情激愤，高喊有黑幕，联名向朝廷状告主考官刘三吾，说刘三吾是南方人，所以偏心。

这件事惊动了皇帝。为了有效收买北方人心，朱元璋诛杀了新科状元，并亲自出题阅卷，增补了61个进士。这61人，全部是北方人。

此后，明朝的科举制度迎来重大改革。大约从1425年起，明朝会试开始试行“南北卷”制度，针对南北方分别录取进士，比例为“南六北四”，即南方占60%，北方占40%。后来，又增加了中卷，把全国划分为南、北、中三个区域，分别录取进士。比例为南卷55%、北卷35%、中卷10%。

这项改革影响深远，直到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实行分省录取制度，“南北卷”制度才最终被废除。

### 清代“按省取中”

明代历时两百多年未能破解的南北人才失衡问题，到清代总算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。

1712年，已经做了50年皇帝的康熙，突然意识到“南北卷”制度虽然可以相对调和南北方的人才结构，但无法解决省份之间的人才比例问题。

他说，“我观察这些年来的进士录取名单，有的省进士很多，有的省进士很少，这不科学，以后干脆‘按省取中’好了。”

所谓“按省取中”，原型来自于北宋司马光的“逐路取士”，跟我们现在高考制度中的分省录取基本一致。

简单来说，就是按照每个省的大小、人口多寡，分配每个省的举人名额。比如，浙江、江西都分到了94名，以后这两个省每届录取的举人就都是94人，再由这94人去参加国考（会试），按一定的比例录取进士。

这种录取方式，对文化欠发达省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。举个极端的例子，在实施分省录取制度前，甘肃连一个进士都没有，实施后，甘肃一共出了200多名进士。

但对科举大省则不是好事。分省录取最大限度地把考试竞争压缩到了省内，一个省中举名额只有那么多，考生都很强的话，竞争肯定就很激烈了。

不过，经过这轮制度调整，清代进士的南北分布，相比明代均衡多了。

在清代总计26800多名进士中，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中举人数，分别如下：江苏2933人，浙江2803人，河北2707人，山东2249人。

两个南方省，两个北方省，是不是比明代前四都是南方省看起来舒服一点？

因为进士名额基本都是按省分配，这个时候单凭一个省的进士数来判定这个省的人能不能考，已经不太准确。

更为准确的数据，要看巍科人物（即会试第一名和殿试前四名）的分布。

从理论上讲，殿试的名次是参考者完全自由竞争后分出高下的，这才能代表全国的水平。

清代产生巍科人物539人，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人数，分别如下：江苏169人，浙江125人，安徽41人，河北38人。

可以看出，无论是进士人数，还是巍科人物，江苏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全国学霸。

早在清初，翰林院里几个文人闲聊，大家谈起家乡的土特产，说来说去无非山珍海味、象牙犀角。轮到苏州人汪琬，他慢吞吞地说：“苏州特产状元。”举座瞠目结舌。

后来的历史证明，汪琬真没吹牛，清代114个状元中，有24个苏州人，占比超过1/5。

江苏和浙江，这两个最典型的江南省份，清代一共出了69个状元（江苏49个，浙江20个），占了全国的一半多。这对于全国，尤其是北方，形成了降维打击。

有时候连皇帝都看不下去，要出手干预，平衡一下。

1750年的殿试，内推第一名是江苏人赵翼，第二名是浙江人胡高望，第三名是陕西人王杰。乾隆一看，问左右：国朝至今，陕西出过状元吗？大臣们说，还没有。

乾隆说，从今天开始就有。

说完，把王杰从第三名调到第一名。在乾隆看来，江苏、浙江的状元已经够多了。

苏浙两省为什么能在最后一个科举朝代独占鳌头？

说起来，科举在清代已经进入了拼资本的阶段——拼经济资本，拼文化资本。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，有能力搞文化建设，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。